

战后国际关系史料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印

目 录

·1961年柏林牆事件·

- 1961年修筑柏林牆——《昂纳克传》摘录。…………… (1)
- 苏联—西方大国——《基辛氏文库》1961年6月关于德
国与柏林问题的报道。…………… (14)

·1968年苏联侵捷事件·

- 1968年苏联侵捷事件中苏捷往返的两封信。…………… (32)
- “布拉克之春”——一个当事人的叙述。…………… (55)
-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柳·斯沃博达在布
拉格庆祝签订苏捷条约招待会上的讲话。
(1970年5月6日)…………… (90)
-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
金在布拉格庆祝签订苏捷条约招待会上的讲
话(1970年5月6日)…………… (95)
- 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古·胡萨克在布拉格捷苏友好群众
大会上的讲话(1970年5月6日)…………… (99)
- 约瑟夫·斯姆科夫斯基致勃列日涅夫的信。…………… (107)

·英美关于原子弹的文件·

- 艾德礼和邱吉尔关于原子弹的声明
(1945年8月6日)…………… (117)

艾德礼致杜鲁门的信(1945年9月25日)·····	(122)
英国目前的原子能政策(布莱克特备忘录, 1945年11月)·····	(127)
华盛顿宣言(1945年11月5日)·····	(140)
格罗夫斯和安德森备忘录(1945年11月16日)·····	(143)
艾德礼致杜鲁门的电报(1946年4月16日)·····	(145)
艾德礼致杜鲁门的电报(1946年6月6日)·····	(147)
托拉斯宣言(1944年6月13日)·····	(152)
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成员卡尔顿·萨维奇的报告 (1951年4月12日)·····	(155)
特别助理阿内森给国务卿的备忘录 (1951年4月24日)·····	(162)
特别助理阿内森呈国务卿的会谈纪要 (1951年5月25日下午)·····	(169)
特别助理阿内森呈国务卿的会谈纪要 (1951年6月14日下午2:30)·····	(171)
政策设计委员会付主任弗格森的会议备忘录 (1951年8月6日)·····	(181)
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尼采关于会谈备忘录 (1951年9月13日)·····	(188)

·附 录·

苏联为德国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斗争, 苏联与民主德国 友谊与合作的发展(1955~1964年) ——《苏联外交政策史》摘录·····	(197)
--	-------

(本辑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张月明同志协助编辑)

1961年修筑柏林墙

——《昂纳克传》摘录

第十六章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

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军事政策和国防问题成为我的活动中心。1956年秋，我担任了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安全委员会书记，受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华尔特·乌布利希的领导。1960年，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组成时，作为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华尔特·乌布利希同时也领导这个机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议会让我担任最高政府机构的部长负责调整国家的防务。这项活动使我能够和一些人经常联系，如当时的国防部长现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威利·斯托福，和他的副手现在的内务部长弗里德利希·迪克尔，现在的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政治部主任海因茨·凯斯勒，还有自1953年到1957年底指挥驻德苏联集团军的A·A·格列奇科元帅。若干年以后，当他已是华沙条约联军的最高司令官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防部长时，我还经常和他会晤。

1956年1月18日，议会通过了建立国家人民军(NVA)和国防部的法令。我支持建立我们的尽可能强大的国家人民军。在军事政策领域里，我的活动前提是基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条件需要而且有可能建立国家的武装部队，使之成为整个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事业。工人阶级和人民

的团结统一，使武装部队能作为一支用之不竭的军事力量来武装保卫我们的共和国。由于工人阶级事业的国际主义特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出现，我们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军事防卫一开始就应该作为一项共同的国际任务。它的实现只有依靠和苏联、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及和其它兄弟国家、它们的军队最密切的合作。

除了国家的性质和武装部队执行的政策之外，高级军官的任命自然而然地取决于一支军队的精神和目的。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国防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中，我们最为注意的是这个问题。为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准备基本干部的决议和决定成了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建立国家人民军的年月里，所服役的大约百分之七十陆海军将官都参加过1933年以前的工人运动，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经受过考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希特勒独裁时期作过囚犯或者被送往集中营。

我把考虑干部工作问题作为最主要的职责之一，对此我极为小心和非常耐心。关于这一点，我经常会回想到热情、老练又十分严谨的威廉·皮克、奥托·格罗提渥和瓦尔特·乌布利希以及其它一些同志他们对我作出了帮助。1956年底，我们精心完成了建立部队组成国家的武装力量，从社会出身来看，约有百分之八十二的将官是产业工人或者农业工人，农民约占百分之三，白领工人约占百分之十二，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约占百分之三以上。

国家人民军是作为一支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的军队，一支为争取和平的、坚持真理的目标而斗争的军队成长起来的。它于德国历史上一切反动东西是截然不同的。它继承了1524年至1526年德国农民战争中军队的传统，继承了1812年

至1823年解放战争中军队的传统，继承了1918年至1919年十一月革命中军队的传统，继承了1920年工人民兵和红色鲁尔军抵抗卡普暴动的传统，继承了1936年至1939年在西班牙的德国国际旅以及1933年至1945年德国反法西斯力量的传统。今天，国家人民军的许多学校、部队、营房、舰队都以一些革命战士的名字命名而感到光荣。

社会主义需要军官具有政治经验和知识，需要他们具有高水平的军事技能。他们必须有一定的阶级觉悟，热爱他们的士兵，关心士兵中的每一个人。我强烈地反对那种到处都存在的观点，大意是认为军队中人与人的关系并不重要，因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事实上有许多事例都证明，当指挥员非常关心战士利益时，任务就出色地完成，战备水准提高，效率也高。确实如此，因为服役是项吃苦耐劳的工作，所以要求军官一定要关心战士们的爱好，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问题和要求。

德国统一社会党支部在武装部队中的首要作用是保证党对国家人民军的领导。我们从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经验中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也是军队的指南。1957年11月，政治局发表了关于我们军事政策的如下声明：“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力量，要用最现代化的武装和技术装备武装起来，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决策，要密切地联系劳动人民。”几个月以后，1958年1月14日，政治局经过周密考虑通过了关于“国家人民军中党的作用”这一重要决定，这个决定总结了两年来建立武装部队的经验。由于这个文件所阐述的原则重要性，它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从这段时期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日程表，以及政治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递送的报告来看，证明了在这些年月

里为了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和国防力量每个重要问题都是经过集中讨论和共同决定的。至今还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改变。

我养成了到军队、支队以及各部队中去调查实际问题的习惯。我的同事经常在部队中度过几个星期，他们同一些将官、士官和士兵们谈话，也和德国统一社会党、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支部的积极分子们谈话。讨论有关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情况，也谈论军官与士兵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我们还经常谈到部队与大型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人的关系，与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生产合作社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谈到与苏联战友的联系。武装部队成员的生活和后勤条件，也始终被列在我们的重要议事日程上。

我清楚地记得，1957年春天我们同各军区司令官、政治部负责人和国家人民军武装部队后勤部门负责人的一次讨论。由于事先作了调查，我们对各个地区的现实条件有了真实了解，如此得到的情况成为1957年6月12日至13日我们在爱格斯道夫会议的基础。华尔特·乌布利希、威利·斯托福、霍曼·马顿、我本人以及一些德国统一社会党、国家人民军重要人物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仔细考虑了如何尽可能快地使人民军强大起来。我们还经常邀请党的书记和司令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安全会议，为的是了解他们对即将产生的决定的意见。

就在那时候，我特别注意到五十年代中期边境警察部队开始成为一支有效的边境防卫力量。长期以来的教训告诉人们，边境挑衅和边境冲突很快会爆发成一场不可控制的军事对抗。我们的国境上挑衅频繁发生，只是靠我们边防战士头脑冷静的行动，才防止了冲突的扩大。这种挑衅的发展归根

到底是出自于西方的这种政策，他们顽固地拒绝承认和尊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境，不愿把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国境。

有二十一名边境警察以及新近的边防军人员遭受到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境内和西柏林那些职业凶手的阴险谋杀。所有这些事实令人确信，为了保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境，抵抗所有的侵犯和挑衅，我们应该大力加强边防战士的装备和训练。所以我坚持认为边境战士的生活和后勤条件应该改善，使他们能够日夜值勤，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能履行他们的艰苦职责。

在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同时，工人民兵的作用也在不断地加强。在西方世界一些有影响的宣传工具，在对我国工人民兵的描绘中，或者是贬低他们作用，或者是被过分地夸大，把他们看作是一支补充军队，总之各种观点都有。事实到底如何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民兵是在1953年作为保卫共和国反对反革命威胁而创立的一支队伍，他们是工厂中工人阶级的直接武装。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集中起来，他们除了生产劳动或者成为专职人员之外，还要掌握军事技术，保卫他们已获得的胜利成果。

我们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防卫作出的努力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点不久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五十年代后半期闪耀过几次希望的火花以后，到1960年—1961年时，新的战争阴云又出现在地平线上。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防军已经成为一支超过三十五万人员的力量。1959年至1960年，国防军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共同举行了同步(Side Step)、快速掌握(Hold Fast)、冬天盾(Winter Shield)华伦斯坦(Wallenstein)*的演

习，无论怎样称呼，都是为了准备入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作的预演。在1961年3月号西德出版的一份杂志《武装政治纵观》中宣称，西方用和平方式使东方屈服的可能性已经用尽了，改变现状的唯一可能是使用武力，否则就要牺牲我们自己的原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在美国的一次新闻会上声称，必须为德国发生内战的某些方面作好准备。

1961年6月初，波恩颁布了咨询会议“关于德国再统一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D日”新计划。整篇报告充满了并且包括各种精确的指令，表明西德垄断集团将如何一步一步地攫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将如何消灭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工会，剥夺他们的权力。1961年7月10日出版的《科隆环球观察报》甚至要求使用“冷战、神经战、热战等各种手段，不但包括使用常规军和常规武器，也包括颠覆、支持内部抵抗、地下活动，破坏法制和扰乱秩序，破坏交通和经济引起市民骚乱和暴动……”不久，“全德问题部长”恩斯特·兰麦和他的参谋人员匆匆来到西柏林，为的是在那儿指挥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心理战。欧洲的北约部队也进入警戒状态。

西方一些有影响的宣传工具开始一场诽谤运动，煽动人们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抛出使人不祥地回想起1939年8月的“避难者的洪水”、“悲惨的避难者”的报告，制造出一种侵略即将来临的气氛。边境的侵犯和挑衅不断增加。为了在居民中散布不安，破坏者又纵火焚烧市内临近列宁铁路车站的柏林屠宰场和市中心的汉堡大学。

*华伦斯坦1583—1634年奥国将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柏林之间边境开放了十二年之久，同样，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边境大体上也开放了十二年。进一步说，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大家庭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开放边境，但它现在却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威胁和平的地区。在西柏林周围已成为导致国际紧张局势和发生冲突的危险地区，而且处于一触即发的形势。

西柏林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中部，有164公里的边境线与我们的共和国接壤，大约有28里边境把西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分离开来。一直到1961年8月为止，这条边境既不安全又不能全部控制。它横贯大街当中，通过公寓大楼，穿过分配区和水道，每天要有近五十万人经过这儿。

西柏林不仅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另一片领土，而且按照他们政治家的看法，西柏林又是“最便宜的原子弹”，一根“东方的肉中刺”，冷战的“前哨城”。那儿发生过不少于八十起间谍和恐怖组织的暗害活动，他们在那儿直接进行大量的货币投机，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在西柏林还建立了招募中心，招募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技术工人，那些寡廉鲜耻的老板从每人身上得到了一大笔钱，但它却被合理地称为人类正常贸易的交换中心。1961年中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侵略集团和他们的一些北约同伙认为挑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动乱的时机已经成熟，一项伪装成“德国内务警察活动”的西德国防军开始行动起来“支援”煽动者。

我们以应有的警惕来注意这些恐吓事件。难道我们能被动地听任这条开放的边境在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中用来置我们共和国于死地吗？难道我们能听任在欧洲的心脏出现这种局面，即西方暗中拚命动员，歇斯底里的战争叫嚣，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样的局面而无动于衷吗？难道我们能在西

柏林已被建成冷战的“桥头堡”，行使它的“侵蚀作用”越来越不受约束的时候，仅仅翘翘姆指而已吗？如果由于我们的迟钝而实际上促进了侵略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欧洲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民族会原谅我们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我们曾经发誓要尽一切力量来制止德国大地上再次出现另一场战争，我们决心在任何情况下用荣誉来担保1961年中，华沙条约国发出了不少警告。3月底，我出席了。华约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着重强调了这种危险，但是也表示了对帝国主义侵略压力绝不屈服的决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着重揭露在1961年中出现的威胁和平的症候。直到1961年7月6日，议会还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以及西柏林参议院提出大量建议，为缔结一份“德国和平计划”而达成协议。但是，看来波恩和西柏林的政治家却把这种愿望错误地理解为我们软弱的表现，或者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无力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对付这种冷战阴谋。

1961年月3日至5日，华沙条约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进行了一次协商，亚洲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在与苏联共产党达成的一项协议中，德国统一社会党提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柏林以及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边境，应该以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习惯方式进行控制。这项提议在莫斯科会议上得到一致赞成。

随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华尔特·乌布利希命令我准备采取必要的行动。我们向我国人民军发出了采取必要措施的命令和征兵的命令，向国家安全部内务部机关、机动警察和人民警察发出了命令，向工人民兵发出了命令，同时也向中央政府各机关发出了命令。交通系统、建筑工业和其它经济部门也积极行动起来。事后，我们满意地注

意到，已经没有什么疏忽之处了。

为了便于领导这次行动，我本人和我的参谋部都驻在柏林警察总局。我经常在那儿和各武装部队的司令官、参谋保持联系，以及和柏林、法兰克福/奥德河、波茨坦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区委会和中央政府的各部门保持联系，并且与柏林市议会、法兰克福/奥德河和波茨坦地方议会保持联系。

1961年8月11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议会宣布，欧洲和平存在着一种极大的危险，命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进行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卫和平。第二天，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决定，依然开放的欧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边境必须处于由国家完全控制之下。

1961年8月12日中午，当我前往道恩湖时，看到道路两侧我们人民军的摩托步兵团已经在他们的集结地集中。下午4点，国防委员会主席华尔特·乌布利希签署的命令生效。这道命令是我们早已经准备好的，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柏林以及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国境安全而采取措施的夜晚，到行动开始前的一小时，我领导的参谋部在柏林警察总局会晤。在场的有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威利·斯托福、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波尔·弗那、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国家安全部长艾里希·米尔克、内务部长卡尔·马隆、交通部长欧文·克拉马，在场还有内务部副部长、柏林人民警察局长弗里茨·伊克梅尔和内务部参谋长霍斯特·恩德。就这样在零点一到，实行警戒，按照事先计划，在星期天的凌晨开始的行动，引起了世界愕然注目。

根据命令，国家人民军部队和人民警察开进了指定地区，和西柏林接界的柏林地区的工人民兵以及波茨坦、法兰

克福/奥德河区的工人民兵也进入了规定地点。我们部队得到了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队的支持，这支部队从1961年8月10日起由苏联元帅I·S·科涅夫指挥。

从1960年7月起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的海因茨·霍夫曼在回顾那些紧张的时刻时说道：“我仍然记得我们是如何调动人民军参谋部和部队的，它们假装成某种军队调动。晚上，艾里希·昂纳克打电话告诉我‘H小时’，并且说道：‘你知道该干什么，开动！’当艾里希·昂纳克到达边境的时候，我们已经艰苦地到达了边境并且让他亲眼目睹我们的坦克和其它部队是否都在正确的位置上。他不仅对我和一些高级军官讲话，而且按照他的习惯也对其他在场人员讲话，向他们解释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措施。”

短短几小时内，我们国家所有围绕西柏林的边境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我曾经建议过，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军事战斗力量要直接部署在边境上，换句话说，来自社会主义工厂的劳动人民穿上了工人民兵的制服，和人民警察一起保卫同西柏林接界的边境。如果必要的话，国家人民军部队和国家安全部机关作为他们的后盾给予支持。并且，只要北约军队卷入这次事件，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也将投入行动。

通过这次事件的过程，表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极为出色地经受了考验。它不是一项纯军事行动，因为安全措施还需要考虑到政治、思想、经济和组织工作的能力。另外，我们也没有可能公开地向我们所动员的，由波尔·弗那领导的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所有党组织交代具体任务。几个小时之内，柏林所有的交通系统变了样，来往西柏林的市内铁路和地下通道全部停止。它只有依靠德国的劳动人民，

还有柏林的交通当局执行全部命令才能成功，这些命令建立在一种服从纪律和对工人党、工人政府的充分信任的基础上，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虽然有几千名劳动人民被召集起来保卫我们的国家边境，或者被动员来向人民解释所发生的事，1961年8月14日，柏林的星期一仍然照常生产，城市供应一如往常，生活继续也基本上正常。

我能设想出，北约参谋部和西德国防军一定非常清楚地了解，象1961年8月13日，这些措施背后统一行动的威力。这项行动只有在无数自愿者的帮助下，在劳动人民中占压倒多数的，理解我们的人的支持下才能成功。在八月份那些日子里，不但显示了我们的军事力量，而且也显示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和我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虽然许多人在回忆中企图歪曲事实，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真相却是，尽管作了充分必要的准备，成功地竖起了反法西斯主义的防卫墙，还是使我们的敌人大吃一惊。因为外国特工人员能够实际上公开地越过开放边境进行间谍活动和侦察，而他们在任何场合中要组织起对付我们行动的真正抵抗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事后，经常有人问我当时我们是否有意识地冒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风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北约不可能因我们领土上发生的一切作出军事入侵的反应。根据我们的情报，如果没有北约的主要力量——美国的加入，北约就不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而美国在西柏林有限的利益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维护西柏林的现状；西柏林保持着西方三方面的势力；西柏林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交通安全。我们的边境防卫措施丝毫没有妨碍这些利益。在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协商会议的公报中，西方力量应该注意到，华沙条约成员国尊重西柏林作为一个特别政治地区的地位。所以我们没有给

于北约进行一场军事干预的理由，我们完全有资格象其它任何独立自主国家一样去做，我们只不过按照联合国规定的国际法把我们的边境置于控制之下而已。和平得到了拯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将来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基础。

1961年8月13日以后的日日月月里，我经常和边境线上的工人民兵、人民警察、战士们在一起，向他们解释我们安全措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代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向他们表示感谢。另外，我也关心柏林、法兰克福/奥得河区，波茨坦区的居民，特别是工人、妇女和青年人，并且也和驻守边境的工人民兵、人民警察以及国家人民军成员保持密切的联系。

几年过去了，许多人才理解了1961年8月13日的全部意义。企图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农力量的“边界行动”的打算还在萌芽中就夭折了，阿登纳的“实力政策”留下的只不过是一片混乱。1961年8月13日晚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登纳时代的结束决非偶然，甚至一些确切地说来并非是我们朋友的政治家在几年以前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行动对民主德国的和平以及欧洲的和平是一项有价值的贡献。

毫无疑问，1961年8月13日使西方领导集团认识到，他们已经被时代抛弃了。自主的社会主义德国既不会被吓倒也不允许被侵占。1961年8月13日为冷战以后的变化提供了前提，即从对抗转变为谈判，走出了缓和的第一步。据我所见，这条道路导致了赫尔辛基协定，尤其是承认了欧洲现存边境和它们的不可侵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西柏林之间的边境同时也是两个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和军事条约国之间的边境线，它一定不会成为一条“热战边境”。所以，我十分

满意地一再注意到，当西方世界的专家和现实的政治家对我们的见解有所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说，1961年8月13日所采取的措施对和平、缓和是极为有益的。

译自"From my life" P163——171 和 P203——213.
Erich Honecker,

傅禄建译 傅禄毅校

“苏联——西方大国”

——《基辛氏文库》1961年6月关于德国与柏林问题的报导(1961年6月24日——7月1日)

编者按：本文摘译了苏美之间围绕着柏林和德国问题的种种往来这一部分内容。虽是该书的编者按过程的先后纂编而成，又是公开的材料，但系统叙述了美苏的政策，有一定的价值。

1961年6月15日赫鲁晓夫就维也纳会议与肯尼迪总统会谈的问题，向苏联人民发表了电视广播讲话。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提出：今年内一定要完成和平解决柏林和德国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作战的大国，不能与德国签署和平条约，苏联将和东德单独订立一项和平条约。赫鲁晓夫的主要观点是：波兰和德国之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线是两国之间不可更改的国界线，任何想要改变这条国界线的企图都将会有引起“热核战争”的危险；如果苏联和民主德国签订和平条约，西方国家必须和民主德国当局就陆路、水路和空中进入西柏林问题进行谈判；西柏林在经过选择的政府管理下，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城市，保证它与世界各地进行来往和联系。

赫鲁晓夫讲话的第一部份是关于裁军问题，尤其是延长的禁止核武器日内瓦会议，第二部份是关于柏林和德国问题。以下是讲话的节录(小标题插入)。

“……我最近从维也纳回来。在那里我与美国总统肯尼迪进行了历时两天的综合性会谈。……你们中许多人已经听到